

而導致了祭文本與道士科儀本之間的相互借用。最後，作者借用潘英海所討論的文化中介概念，詮釋做社會文化史研究需要透過一定的能動主體才能看到更加多維的世界。

總體而言，這本書絕大部份文章都是討論道教的儀式傳統和文本問題。儘管部份作品仍舊在用「大、小傳統」這樣的觀念來看待地方道教與正統道教之間的相互關聯，背後的二元關聯意識還比較濃重，尚未達到地方文化多元互動過程的效果。但是各篇作品都從不同的側面來展示儀式文獻與儀式實踐的關聯，讓我們看到了儀式文獻研究的諸多價值。

不過，由於各方面的制約，這本書在選文方面多是側重道教和禮生，對香花僧等地方儀式專家的文本尚未涉及，選題面有點打折扣。此外，在諸多道教儀式文獻的研究中，科儀本佔據多數，金書、法決、文字式等其他類型的文本探討得較少，還需要不斷努力。

覃延佳

雲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

조세현, 『천하의 바다에서 국가의 바다로——해양의 시각으로 본 근대 중국의 형성』, 일조각, 서울, 2016, 510pp.

從海洋的視角考察近代中國的形成過程，研究海洋與國家之間關係，是近年來學術界探討的熱點問題。韓國學者曹世鉉在新近出版的『천하의 바다에서 국가의 바다로——해양의 시각으로 본 근대 중국의 형성』(《從天下之海到國家之海——以海洋的視角看近代中國的形成》)一書中提出，19世紀以前，清朝在東亞構建中國式世界秩序，維持比較穩定的國際關係。明清時期的海禁政策遏制了東亞地區的海洋交流，因此，在東亞海域除了海盜之外，幾乎沒有發生海洋糾紛。但到清末，西方列強瓦解傳統的海禁體系，由此，中國的近代開始了。由於清朝橫跨近世與近代，清時期前後對海洋的認識截然不同。近代以前海洋是開放的，基本上不存在國境以及領海概念。但受到西方列強的衝擊後，中國走向近代國家，伴隨着海洋境界以及領土概念出現變化，其過程中，國家逐漸進行了海洋領土化。本書即探討近代以前中國「天下之海」概念變為「國家之海」概念的過程，及其過程中發展形成的東亞地區國際秩序。

全書共分為六個部份。包括：引言、緒論、第一篇「海洋秩序的重組（1840-1894）」、第二篇「領海的誕生（1895-1911）」、第三篇「圍繞海洋近代韓中關係」以及結論。

本書的引言主要進行了學術史的回顧、研究概況及全書佈局的介紹與引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東亞各國海洋史研究情況介紹，並說明了作者寫作該書的主要目的。作者認為，東亞的近代是從海洋開始的，但從海洋史觀點探討東亞近代的論著並不多，尤其是在韓國，目前有關海洋史研究的專著不多，特別是關於中國的海洋史研究還在起步的階段。韓國的海洋史研究大概從1990年開始興起，主要是從擴大韓國史研究領域的意圖出發。之後，有些大學紛紛設置海洋研究所，如海洋人文學研究所、海洋文化學研究所、海洋城市學研究所等，這些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致力於從海洋的角度重新解讀歷史。這些海洋史研究的成果總體來說有幾個特徵：一，海洋史屬於國際關係史領域；二，以張保皋、李舜臣等特定歷史人物為中心；三，以領土問題為中心。總之，韓國海洋史研究中也出現封閉、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傾向較強的問題，直到21世紀開始才逐漸脫離這些現象。

日本學界的海洋史研究人員主要以日本史研究者為主，海洋史為國際關係史的一部份。1990年代開始，日本學術界擴大東亞海洋史的研究範圍，由此流行所謂的海域史，即研究範圍從東中國海擴大為印度洋等整個亞洲海域。如濱下武志等人的研究脫離以往的以國民國家為中心的研究方式，重視亞洲內部的國際秩序以及區域經濟貿易圈。作者認為，日本學界包括歷史學人文學科的學者當時參與了國家的新海洋大國戰略。作者在書中同意葛兆光的觀點，即「日本的海域史研究反映了日本從島國走向海洋國的國家意識形態」。

中國學術界的海洋史研究方面，作者簡單梳理了1980年代「海洋史學」後的中國的海洋史研究動態。作者認為中國的海洋史研究，主要是因受到西方的衝擊而反思、重視的。西方的衝擊有兩個方面：歷史上，近代中國曾受到西方帝國的海洋侵略；現實學術方面，受到歐美的海洋史研究成果的衝擊。因此，從國家主義觀點出發的研究成果較多。尤其是近代海洋史研究的領域，主要是海運史、海防史、海軍史、海疆史等與政治經濟有關的領域為主，有關海洋經濟史、海洋社會史、海洋文化史、海洋生態史、海洋科學史等領域研究成果則較少。不過整體來看，中國的海洋史研究中，海關史、近代海防、海軍史方面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水準；臺灣學術界的海洋史研究，最大的特點是許多臺灣學者將海洋史研究與臺灣獨立論以及「海洋臺灣」論連

在一起，試圖以此區別與大陸的海洋研究。

作者認為中、日、韓三國的海洋史研究者大部份是本國史研究者。這種情況貌似很正常，但是各國學者從本國的立場和利益出發解讀海洋的可能性很大，而以本國史為中心的歷史敘述很難保證歷史敘述的客觀性。其原因，他認為主要是因為東亞地區不是海洋主導國家，而是國家主導海洋。

緒論主要論述清代的海禁政策與海洋用詞變化。其中，海洋用詞變化研究值得一提。作者認為海洋用詞在近代前後有所變化，海洋用詞變化影響當時人的海洋概念和認識。

本書正文共有三篇。第一篇「海洋秩序的重組（1840-1894）」講述洋務運動前後的海洋與國家，以及萬國公法。作者關注兩次鴉片戰爭後中國與列強之間簽訂的條約中有關海洋的條款，即有關海運、海關、海軍的條款。作者通過這些條約條款分析近代海運業興起的原因，以及傳統的水使轉變成近代海軍的發展過程。作者還探討在清朝與外國之間的海洋糾紛中萬國公法如何起作用。

第二篇「領海的誕生（1895-1911）」論述了清末新政前後的海洋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作者認為該時期是積極接受近代國際法的時期，可以稱之為國際法時代。作者通過中外簽訂的有關條約分析中國人的領海觀及其變化：其一，甲午中日戰爭後清朝與列強之間簽約的租借條約中的領海概念；其二，清末新政時期，中國的領海概念中內海變成領海的過程；其三，清朝放棄傳統的海防體系，接受近代海洋秩序的過程；其四，甲午中日戰爭後海軍的重建與條約簽訂；其五，通過漁業紛爭、島嶼紛爭，考察中國近代海洋觀的變化。

第一篇與第二篇主要是對以往研究成果的整理並稍作補充說明。雖然目前韓國學術界較少關注中國海洋史，但作者從海洋史的角度重新整合有關研究成果，這是作者對韓國學界的一個貢獻。而本書最精彩的部份在第三篇。

第三篇通過海運、海軍、漁業的問題，深入探討19世紀朝、清關係。作者主要分析朝鮮與清朝之間有關海運、漁業的條約及通商條約等具體條款，及其引起的兩國之間的海洋糾紛問題。據作者的研究有如下發現：第一，1880年代北洋水師主導朝鮮與清朝關係變化。在朝鮮內部發生政變（壬午軍亂）時，北洋水師的新式軍艦掌握黃海和東海的制海權，由此掌控朝鮮的政局，北洋水師的海軍曾押送朝鮮國王的父親大院君。之後，朝、清關係從傳統的朝貢關係變成軍事干預附屬關係。但甲午中日戰爭後簽約的《韓清通商條約》，使朝鮮脫離清朝附屬關係而變成對等關係，中朝關係從傳統的朝貢

秩序變成近代的條約秩序。第二，海禁解除後，清朝船舶進出朝鮮海域，清朝漁民在朝鮮海域進行非法海釣以及走私貿易，導致清朝與朝鮮之間發生海上糾紛。甲午中日戰爭前後，清朝與日本之間圍繞朝鮮海域展開海上衝突。東亞各國之間的海上衝突及其產生的條約簽訂，說明東亞海域進入近代萬國公法運作體系。

在結論中，作者通過本文的研究結果，回答了以下幾個問題：第一，中國與列強之間的條約，如何反映中國的海洋觀？作者認為，這些條約明顯反映近代中國的海洋觀變化。如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清朝還沒有近代海洋意思，而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逐漸產生近代海洋意識。第二，清朝被編入萬國公法體制時，東亞海洋秩序如何重組？近代東亞海洋反映從朝貢體系轉變到條約體系的過程。條約體系，即萬國公法體系。萬國公法體現海洋國際法的特徵，因此，萬國公法影響了中國人的海洋觀。洋務運動時期，在東亞發生的各種海洋糾紛和衝突都與萬國公法有關。第三，近代中國海軍建設與沒落，與海權意識有什麼樣的關係？海戰很明顯體現海洋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中國的近代海軍，其作戰範圍從沿海逐漸走向大洋。在此過程中，中國產生了對海權的覺悟。清末新政時期的海軍建設與沒落，都影響海權意識的強化。第四，近代中國的海洋史如何影響韓國的海洋？作者認為，清末中國與列強之間的海洋糾紛中，中國是受害者。但清朝與朝鮮之間發生海洋糾紛時，清朝卻扮演了相反的角色。北洋水師的海軍實力佔優勢日本的海軍時，清朝直接動員武力干預朝鮮內政。洋務運動時期《朝清貿易章程》中的有關海洋條款，顯示冊封朝貢秩序與萬國公法秩序混在一起。甲午中日戰爭後的《韓清通商條約》，表明從傳統的冊封朝貢體系瓦解走向近代相互平等的海洋關係。第五，近代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海洋紛爭如何影響今天的東亞海洋紛爭？作者認為，近代東亞各國之間的海洋糾紛與傳統的海洋糾紛之間有很大的區別。近代國家直接介入干預海洋糾紛，使海洋成為國家之間激烈競爭的舞臺。今天的東亞海洋糾紛，其起源來自於近代海洋糾紛。

由此，作者認為，近代以前，海洋不是國家權力干預掌控的政治空間，而是自由開放的空間。當時並不存在海洋境界。然而，近代列強進入東亞海域後，在海洋出現境界和領海的概念。因此近代國家概念和國際體系的重組或解體後，才能解決其根本的矛盾。

該書尋找東亞地區海洋糾紛的歷史起源，同時，通過海洋重構中國的近代史，希望脫離以往的民族主義海洋史，回歸普遍的海洋史研究。該書提出研究海洋史的目的是復原近代海洋空間，進而全面把握整個人類的歷史，而

這一點是以往的歷史學中一直疏略的。

作者曹世鉉曾留學中國，從事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其成果代表韓國學者對中國歷史研究的高度。本書涉及許多方面，如本書引言中作者所闡明，涉及政治（海禁、領海、海權）、經濟（海關、海運、漁業）、軍事（海防、海戰、海軍）、文化（海洋觀、海洋文化）等諸多領域。但因體系龐大，有些方面的研究略嫌粗略。如海關方面，本書的研究沒有專門研究海關問題，只在敘述海洋紛爭中提及海關問題。而海洋文化方面的研究則幾乎沒有。第二，部份領域的文獻利用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論述中國與朝鮮之間的問題時，作者主要利用朝鮮文獻。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問題，作者則主要利用中國文獻，因而出現論證上有些偏向和不全面的問題。第三，空間方面的局限性，本文雖說探討中國海洋，但實際上主要探討東海與黃海，尤其是黃海，而且主要論述對象不是海洋本身，而是海洋與國家的關係，由此造成海洋空間感欠缺，因而作者提及的「復原近代海洋空間」目標很難完成。

筆者認為，這些問題與作者的敘述理念有關。如本書引言中作者闡明，該書與 Fernand Braudel 的著作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將海洋作為周邊國家的主要歷史舞臺不同，該書並不是從地理學的角度解釋歷史時期的海洋史，而堅持傳統的歷史學研究法，特別是政治史。本書通過以政治史為中心的敘述，賦予國家在歷史舞臺上的核心地位。由於將政治學作為歷史敘述的核心，本書實際上重點敘述中國對抗歐洲列強或日本的過程，以及朝鮮對抗中國的過程。因此，整體來看，本書實際上是「從中國視角看近代海洋的形成」。

黃普基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